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 一 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 二 救亡压倒启蒙
- 三 转换性的创造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① 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① 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赞扬学生爱国运动而反对新文化运动(如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有人则反之,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胡适,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第391页,台北)。但绝大多数认为二者有极密切联系而视为一体,本文同意此看法。“五四运动”一词,始见于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罗家伦(署名“毅”)的文章。新的考证认为:1919年5月18日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为名义发表的“罢课宣言”中已有此词。

一 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办《青年》(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这实际的发刊辞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即是不久后提出“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先声。《新青年》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陆续发表了易白沙、高一涵、胡适、吴虞、刘半农、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各种论说和白话诗文,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和传统道德,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传统文艺,强调必须以口头语言(白话)来进行创作。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近代文化)反“中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它们并无根本的不同,甚至在形式主张上(例如上述陈独秀提出的六项标准与梁启超的许多论说)也相当接近或相似。那么,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有空前的气势、作用和影响呢?

当然,量变为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

烈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而它之所以能在当时作为一个“运动”而兴起,获得广泛的注意和传播,则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具体产物。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① 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例如邹容《革命军》中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普及,完全淹没在呼号革命的军事斗争中。孙中山在辛亥后赠以“大将军”的美谥,倒正好是这样一个象征。宋恕《六斋卑议》中反宋明理学的突出的启蒙思想,更被挤到角落里面,几乎至今无人注意。

辛亥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皇帝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另方面,正因为此,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便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时代去。对知识者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一代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前景何在? 路途何在? 渺茫之外,别无可说。

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是鲁迅塑造的这种典型形象,具

^①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

有很深刻的代表性。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

这一呼喊是中国先进知识者们深思熟虑,经过重新长久考虑思索的结果。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春发表了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其中说:

……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①

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②

这里强调提出了“多数国民之运动”问题。也就是说,以前的洋务、变法、革命,最多也只是运动群众去实现反帝或反清朝的目的;结果“多数国民”并没有得到民主权利,也没有自觉的民主要求,自然让极少数人主持宰割。民国号称“共和”“立宪”,招牌虽异,实质仍同。人民仍然不过是盼望好皇帝和清官,仍不过是“希冀圣君贤相之施行仁政”而已。这怎么能谈得上政治进步国家富强呢?所以,首要的问题便不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唤起民众的觉悟,来自觉自动地争取民主。那么,“觉悟”什么呢?陈独秀接着

① 《一九一六年》,《青年》第1卷第5号。

② 《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第1卷第6号。

说：

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①

这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打倒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理论论据。即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以前的变法、革命都不行，必须首先要“多数国民”产生与“儒者三纲之说”的传统观念相决裂，转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的“最后觉悟之觉悟”，才有可能。从而，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便成为新文化运动基本特征之一。有的研究者因而称之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② 所以，与上一阶段谭、严、梁相比较，不但其反传统文化的彻底性大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陈独秀便曾明白无误地宣称，他办《青年》杂志“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以此要求与当时其他一些报刊明确区别开来。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主角人物，与上一阶段康、梁、孙、黄也不同，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

① 《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第一卷第六号。

② 这与陈独秀等人也许不自觉地仍然将思想意识看作根本关键的儒学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即以所谓“文化思想方式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有关。（参看林毓生《中国意识之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1979 Wisconsin）但其现实的这种自觉意识历程，则仍然是洋务的经济改革、戊戌——辛亥的政治变革的失败所造成的。

农、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均大体如此。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

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抛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抛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 and 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例如,五四前后之激烈抨击孔子,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自袁世凯到张勋都用孔子作他们搞政治复辟活动的工具。“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的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可见这种顽固

的思想,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①“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②，“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那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③此外，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日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关。即不管传统的、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知来裁定、判决、选择、使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它最早成熟在先秦各家的社会政治哲学中，而在孔学儒家传统中表露得最为充分。所以，有趣的是，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却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的优良的传统，承续着关心国事民瘼、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

以上种种，使得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

① 毋忘：《最近新旧思潮冲突之杂感》，1919年4月13日《国民公报·每周评论》，见《五四运动文选》第233页，三联书店，1959，北京。

② 李大钊：《圣人与皇帝》（1919年10月5日），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84，北京。

③ 李大钊：《乡愿与大盗》（1919年1月26日），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84，北京。对照谭嗣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仁学》）。

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学生爱国运动更有其由来久远的传统。由于中国士大夫素有上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怀国事民瘼的观念意识和伦理精神,从汉代的大学生运动,到清末的甲午公车上书,和辛丑后留日学生的投身革命,都可以说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前驱和榜样。民国以来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极为痛苦地刻印在共和国第一代年轻的知识学生的心中,早在一九一八年,与新文化运动并列,学生们便有各种爱国救亡团体的组织。例如与“新潮社”、《新潮》杂志同时的“国民社”和《国民》杂志,后者用的便仍然是文言文,而着重于宣传反帝救国。中国知识分子们始终在关切着国家大事。到欧战结束和巴黎和会时,原以为“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将有出头之日;不料反遭列强欺压,德占青岛的主权竟被转让给日本,而政府卖国,准备签字。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终于爆发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这种从未曾有的学生“闹事”。当时的“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
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
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
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
山东大势一去,
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破坏,
中国就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
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
出来维护公理，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
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中国存亡，
就在这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当时还有一个由国民社许德珩起草的文言文宣言。但没有这个体现了新文学特征的白话宣言那么在学生中具有煽动力量和广大声望。这个宣言上与陈天华的《猛回头》，下与一二·九运动“华北之大，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传单，是多么一致。这是救国的呼号，民族的呐喊。执笔者是新文化运动中颇负盛名的新潮社主角之一的罗家伦。《新潮》的另一主角傅斯年在五四游行时也担任过指挥。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李大钊参加了这次游行，并几乎被捕；陈独秀在五四后不久因散发传单被捕三个月，然后逃往上海……。可见，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与原来搞爱国反帝的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或领导。从而，新文化运动开始期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主张也就不再能保持了。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既同步

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

首先，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救亡把启蒙带到了各处，由北京、上海而中小城镇。其次，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从北京到各地，那些在爱国反帝运动中打先锋作贡献的，大都正是最初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青年学生。这两个运动的结合，使它们相得益彰，大大突破了原来的影响范围，终于造成了对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大震撼。

一方面，例如，“（一九一八年七月）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份定期刊物，取名叫做《国民杂志》……，它只注意反军阀、抗日的政治活动，没有尽力白话文的宣传，所以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狂澜中不为人注意”^①。“五四运动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而响应援助，罢课游行的潮流自北至南，沿京津线而津浦线而宁沪线，终抵广州。上海学生所起作用极为重大，六月一二三日北京政府正在连日大捕讲演学生，上海学生想尽方法运动罢工罢市，终于获得先施、永安两大公司的同情出而领导罢市，于是上海全市罢工罢市，而罢工罢市的潮流遂自南至北，沿沪宁线而津浦线；到了天津罢市，北京政府大为震动，深恐北京罢市旦夕实现，只得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人，……”^②

另方面，例如，“自民六至民七，文学革命的问题虽已渐为社会人士所注意，然究竟还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未能普及到全国。至民八，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文学运动随着五四运动的高潮而扩大，而进展。在五

① 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北京。

② 同上书，第310页。

四时期，白话报纸风起云涌，各地学生团体的小报纸，形式略仿陈独秀所主编的每周评论，至少有四百种。白话的杂志也出了不少，如《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等。性质与《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还有许多日报的副刊也都改登白话作品，较为重要的，北方有《晨报副刊》，南方有《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对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①

学生爱国运动在政治上的空前胜利，当然冲击了旧政府和政府所维护的旧传统的权威感和控制性，使启蒙能凯歌行进。从当时的文献和之后的各种回忆录看，都是说，五四学生运动之后，青年们思想和行为大为解放，他们得到了空前鼓舞，于是努力于冲决各种传统网罗，“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本来，以西方的个人主义来取代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就是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②。“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二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③。

要变易“家族本位主义”，否定传统纲常，首先便是反

① 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第612页。

②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第1卷第4号。

③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孝”。因为，皇帝既然没有了，几千年的“忠君”已经谈不上，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但是，民国以来不断演出的复辟丑剧又证明“忠”纲犹在。这“忠”纲正是由“孝”纲所支撑的。从而，当时这些知识者抨击“孝”便有这两方面的论证：一是启蒙性的，即追求个体从大家庭中冲决解放出来，以取得自由、平等、独立的权利和地位。一是政治性的，即揭露“孝”是“忠”的基础。这两者性质并不全同，批判时却紧密地连在一起，未加分割。

详考孔子之学说……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①

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②

前者发表在五四前，后者在五四后；前者是一般民主主义者的论述，后者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解释。但二者在攻击儒家理学的“孝”是“牺牲个性”、维护家族，是专制政制的基础，相当一致。前者从一般民主主义出发，也抨击孔学孝道的反动政

①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②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178页。

治作用，后者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也指出对个性的扼杀。两者重点显然都在指出孔学“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等儒学基本命题（三纲五伦）有内在联系。这实际也仍然是谭嗣同在《仁学》中大骂“荀学”痛责“名教”扼杀人性和为君主服务的批判的继续和发展。不同的是：（一）彻底性激烈性大增，特点是直接抨击“至圣先师”孔子。易白沙在一九一六年发表的《孔子平议》中说“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孔子弟子均抱有帝王思想”。痛骂孔夫子，打倒孔家店，这当然是惊世骇俗、吓人闻听的空前创举。（二）在政治批判和个性解放的双重性中，后者的成分比以前毕竟远为突出。并演变成实践的行动，使青年一代知识者的行为模式开始有所变易。这一点非常重要。

个人应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这在康有为构思《大同书》时便已非常明确，但康却深恐先进的观念变而为实际的行动，所以秘而不宣^①。老一辈的先进知识者，不仅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就是鲁迅、胡适等人，其观念意识与行为模式也仍然有着很大的距离。对家族制度和传统家庭可以进行激烈的批判否定，但在行为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对父母、兄弟、妻子的传统规范和要求。以致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认为他们是理知上面向未来（西方），情感上回顾传统（中国）。^② 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这个结构的改造转换，仅凭观念的变化，是并不能真正实现的。必须有行为模式真正改变。

① 参阅拙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② 见 Levenson 的《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儒学中国及其现代命运》），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195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五四及以后的年轻一代,开始勇猛地作这种改变。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个体从旧传统家庭中的出走。其原因并非经济或政治,多数是婚姻自主问题,特别是女青年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恋爱自由而抗婚而自杀而出走。充满在当时新闻、论说、文学中的,便经常是这一主题。妇女解放可以作为社会解放的某种尺度。在五四以后,新一代知识妇女由观念革新所带来的行为改变,正具有这种意义。它是个性解放问题,同时却又是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所引起的反应正是政治性的压制、干扰、打击、破坏,它激起的是保守派、卫道者的攻击、诬蔑、丑化、迫害。从胡适提倡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的巨大反响到鲁迅为女师大风潮痛斥章士钊、杨荫榆,都反映了这一特色。可见,即使过了五四之后,中国的启蒙运动仍然注定了与政治斗争密切关连。就在一些远离北京的外地和一些似乎非常细小的问题上,也如此。

……斗争最尖锐的是女子解放问题。现在的青年决不会想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是经过长期激烈斗争才得来的。……请再看几个当时的具体生动事例。

一九二〇年五月出版的《威克烈》第十九期,载有小燕女士所写的“我剪发的经过”,摘录如下:

“第二天,我母亲已经把舅父请来了,把这件事情同他商量。他是满清一个举人,当然照着举人所见的道理,先就大骂我一阵,然后同我母亲一路到我房里,质问我。他问的话,我记不清了,不过本诸孔孟之道罢了。我也不让他,一一地把他驳了。后来他道理穷了,只好站起发作道:又不是我的女儿,我管你做什么?说了一抽身走了。我母亲又骂我一会子,最终还说:无论如何我不准。……”

“我回家,我母亲见我剪了发,果然大哭大闹,并且辞别神

主,要去自杀”。

这时成都首先突破剪发禁关的,是益州女学、蓉城女学、女子实业学校的几个学生,接着响应的人渐渐多了。封建地主阶级不让女子有剪发的自由,认为这是女子造反,用尽了百般手段来威胁禁止。一九二一年,军阀刘存厚手下的省会警察厅竟张贴皇皇布告,禁止剪发,《半月报》提出反对,警察厅竟把它明令查封了。五四运动中查封报馆,这还是第一次,而罪状是为了反对禁止剪发……。

男女同学问题在当时最迫切的,是女子没有入高等学校的机会,自然最根本的还是如剪发一样,是人身自由问题。当时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国民公报》,在其“虚虚实实”栏,竟有署名“笑声”的,对男女同学做出这样无耻的诬蔑:

“既可同板凳而坐,安可不同床而觉,什么是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庙。”……^①

如果说,施存统在浙江写了篇《非孝》,而引起“‘非孔’‘非孝’”,那就大逆不道,这还了得……一时真闹得满城风雨。不久《浙江新潮》被反动政府通令查禁,校长经子渊也就被迫离校,陈望道夏丏尊也都离去了。”^② 这还只是观念的犯禁的话;那么,自由恋爱、女子出走,便成为行为的越轨,更是舆论攻击、政治迫害的对象了。五四学生运动的胜利推动了这一个个体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又引起更严重的政治斗争。先进者和反动派双方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个客观的趋势和规律。毛泽东在长沙发动的思想运动,也是以被逼出嫁、轿中自刎的新娘作为政

^①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第882页。

^② 傅彬然:《五四前后》,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第748页。

治宣传的自觉主题的。

而由观念变迁、宣扬西化,到开始从实践中改变行为、创造模式,正是五四新一代青年的特征之一。

除了个体反抗之外,当时另一颇具特色的行为模式,是青年一代自发地相互联系,通过构成团体、组织来追求真理和实践某种理想。当时各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小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如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一九一八年四月),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一九年七月),周恩来的“觉悟社”(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及新潮社(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国民社(一九一八年十月),“工学会”,“共学会”……等等。这些小组织小团体的“宗旨”不一,大多相当模糊笼统,如“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新民学会)等等,但在这模糊笼统中,却又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新的理想社会或社会理想的一种实践性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当时青年是面向未来作乐观的眺望,希望去实现那种理想的完美社会,而并不是对黑暗现实作绝望的反抗而已。他们还没有现代主义那种荒谬感、孤独感、无可依归感,他们还不是为反而反,不是纯批判性或破坏性的捣毁,而勿宁是在追求某些肯定性的理想。这当然与当时的时代和现实有关,同时又仍然是中国民族某种传统的表现。^①这也正是当时先进青年为什么要结成团体,为什么各种社会主义在他们之中会风行一时的原因。“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

^① 参阅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①

“蜂拥而来”表示了其可接受性。之所以接受，则说明当时青年向往一种真正完美的理想社会，即不但要超过当时黑暗落后的中国现实社会，而且要超过当时虽先进却弊病百端的西方资本主义。有如李维汉所回忆，“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②。

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不仅召唤着他们去革新观念，扔弃传统，打碎偶像，而且还使着急的青年们（年轻人一般比较性急）立即要求实践，立即由他们自己去设计、组织、建立这个理想的社会。这种事例中最突出的，便是五四后轰动一时，吸引了不少青年，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积极帮助，有毛泽东、恽代英等人热情支持的“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是由当时最著名的组织和影响最大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王光祈所倡办的。它的《旨趣书》中说：

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使社会上劳力的工人都去求学，要求高深学问的人、求学的人都去作劳力的工。

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

“工读互助团”被宣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被称为将通过“工读互助团”

① 丁守和：《中国现代史论》第1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

②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09页。

的“逐渐推广”而实现,届时则“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

一些具体的规定和办法是:《简章》除确定“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原则,“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外,还有如下条规和说明:第一,所得归公。“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第二,各尽所能。“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譬如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始可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第三,团体供给。“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互助团正式成立后分为四个组,……每个组内又分为三五个“局”,分别从事食堂、印刷(印信封、信纸)、补习英文、洗衣、电影、织袜、缝纫和各种小手工艺劳动。每日工作时间,大家超过《简章》规定的四小时;除吃饭由团体供给外,其他费用仍由个人自理。尽管如此,他们的“共产主义”热情并未减退;相反,他们还实行了不少在《简章》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措施。如第一组,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就可以自由捡来穿。为了尽快实现没有任何约束的“共产主义”,他们“一致主张和家庭脱离关系”,废除婚姻约束,于是“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他们认为“现在的学校是资本阶级的私产。校长、教员是资本家的雇员。一般学生是资本家的子弟”,因此主张和学校脱离关系。“凡是从前在学校里的都退出来,改为旁听生,如此等等”。^①

但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由于它的‘共产’步伐迈得最早、最

^① 宫守熙:《工读互助团的兴起与失败》,人民日报,1984年2月10日。

猛,短短两三个月,就暴露出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组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食堂里发生经济危机,使团体供给吃饭也大成问题。结果,除出一二人以外,都不愿去维持它。三月二十三日开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解散,成了整个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的先声,在新文化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到同年六七月,其他几个组和各地的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个别的勉强维持到1921年初,也不得不发表解散宣言。”^① 曾经“有数百人报名参加,有些外地的青年学生也闻讯赶来”^② 的理想组织,就如此短命,完全失败了。

当时这种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设想和实验,并不只独此一家。周作人曾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发表文章介绍日本的“新村”实验。毛泽东1919年曾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一九一八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③

恽代英在1919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香浦(即林育南)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所以需费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举一人做会计,专管对外金钱出入的事,举一人做买办,专办向外处购买或出售各事。村内衣服都要一致,能男女都一致更妙。会食在一个地方。设图书室,工作厂。对内如有女子、儿童的教育事业,应该很注意,因为是新村全体幸福所托。对外鼓吹文化,改造环境的事业,亦很

① 宫守熙:《工读互助团的兴起与失败》。

② 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84,北京。

③ 同上。

要注意。我想,我们新村的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兼营畜牧。这样做去,必然安闲而愉快”。^①

.....

应该说,这两种行为模式——从家庭出走的个体反抗,和组织理想社会的群体意识,都没有行得通。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当时便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是回到旧规范的怀抱,便是像子君那样的悲惨死去,或者进入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上的某种花瓶。就是男性的娜拉,命运也好不了多少,连指导和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新青年》一伙和《新潮》一伙也都“或被黑暗吞噬,或自身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么?他们与鲁迅所看见的辛亥的革命一代并无太大的差别。可以有新的吕纬甫、魏连芘……。

二 救亡压倒启蒙

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体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那么,出路究竟何在?明显的答案之一便是:

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拿社会来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不可能的。那么怎么样呢?就是: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来谋全体之改造。(施存统)^②

绕了一个圈,从新文化运动的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激

① 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84,北京。

② 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522页。

烈的政治改革终。政治,并且是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又成了焦点所在。如前所说,陈独秀不但完全改变了“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初衷,而且还突出地强调,“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①。不复是“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②,而是“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③。

这就可以理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使得这些本以宣传西方民主自由、以启蒙民众为要务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如此迅速地转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具体原因便正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一切问题根本解决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革命后的俄罗斯似乎已经在开始实现它:

……没有巴力门(议会),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这是 Bolsheviki 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④

这不与“工读互助团”的思想非常接近么? 小团体的平和实验失

①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

②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③ 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522页。

④ 李大钊:《Bolsheviki 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600页。

败了,大社会的革命改造却可以成功,这似乎证明着马克思列宁胜过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胜过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陈旧理想了。这个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李大钊最先接受了它,并把它介绍给中国知识界。李大钊在1919年5月、11月的《新青年》6卷5、6号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当全面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以后与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又说明: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斗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做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①

陈独秀不久也强调区分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指出,“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的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②所有这些,说明原以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的文化斗士,这时却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组织群众,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推

① 《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37页。

②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

翻旧制度,以取得“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这样,其他一切才可迎刃而解。再不是“伦理的觉悟”而是阶级斗争的觉悟成了首要和“最后的觉悟”了。从而,一切问题、所有出路便集中在这个发动组织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焦点上。承认或拒绝、积极参加或退避拒绝阶级斗争,就日益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一条基本区划界限。这条界限与其说是由“学理”上争论或论证得出的结论,毋宁说更是当时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历史结果。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在哪里?如何能解决这么多的一大堆社会问题,性急的年轻人一般很难满足于“多研究些问题”和点滴改良,何况这种研究和主张改良并没带来多少成效,于是求“根本解决”——进行阶级斗争便自然地成了更富有吸引力的方向。形势比人强,尽管杜威、罗素来华讲演,也轰动一时,但急进的青年却更多地接受了那点非常简单幼稚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组成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批批地走向了工厂、矿山和农村,进行“阶级斗争”。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接受是经过一番自愿的思想斗争的。在马克思主义占领他们之前,许多急进青年们都接受过、信仰过、热衷过无政府主义。^① 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都如此。本来,无政府主义最适合于既要求个性解放又具有社会理想的新一代。反对一切压迫、剥削;反对一切权威、束缚,主张人人劳动、工作、互爱、互助……,这不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个体自由和社会幸福的理想世界么?

“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包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除之扫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寄生者、无首领、无官吏、

^① 这一时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的流行,其性质已不同于辛亥前。它已不属于民粹主义范围,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狂热。这是刘师复不同于刘师培之所在。

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唯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蔡和森）^①

直到五十年代后期，一位老共产党员和我聊天时，还说，他的理想是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一时实现不了，所以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便最后再达到那个“无政府”的理想世界。其实，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年也曾如此。

……我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期，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毛泽东）^②。

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毛泽东）^③。

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蔡和森）^④

无政府党最后的理想，我以为列宁与他无二致。不过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我以为一定要用俄国现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蔡和森）^⑤

……不过 A·ISM（引者按：指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

① 刘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 599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8 页。三联书店，1979，北京。

③ 1920 年 12 月 1 日给蔡和森信，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 3 集。

④ 1920 年 8 月 13 日给毛泽东信，同上书。

⑤ 1920 年 9 月 16 日给毛泽东信，同上书。

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据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A·ISM的思想在人心中是会常常发现的,但要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不能得用了。(周恩来)^①

.....

这就是说,无政府主义虽然好,“我以为列宁与他无二致”,但无奈“流为空谈”,“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看来只有“用俄国现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才行。无政府主义特征之一是彻底的个体主义。它主张通过社会革命立即实现个人的绝对自由,它十分激烈地抨击资本主义和一切黑暗现实,这本与当时青年求个体解放非常吻合,所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它坚决彻底地批判旧世界,又使青年们很容易把它与马克思主义混同起来。“不少的人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②,“李大钊尚且受有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其他可想而知。就到一九二一年,也仍有人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混为一谈。……也有的是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主张不要国家的”^③。这表明就理想社会和反对现实而言,当时青年们注意的是它们的共同处,而未深入从理论上看到两者的基本出发点(个体或人类总体)的不同。

但是,不久之后,无论是在国内或在法国勤工俭学青年中,就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本文不打算论述这场论争。但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战胜无政府主义,与其说是在理论上弄清了两者的社会理想和革命原则貌似而实非的差异,还

① 伍豪:《欧洲的赤况》,《觉悟》第2期,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6—27页。

②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603页。

③ 同上书,第505页。

不如说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套切实可行已见成效(十月革命)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的战略策略。正是这些,符合了急迫追求实效的当时青年们的现实要求和中国实用理性的无意识心理传统。而马克思主义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便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调和实行。蔡和森说:

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而尤其深恶痛绝掺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景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①

这当然不止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正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在对各种社会党和修正主义激烈的批判中产生的。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建党,即建立一支有铁的纪律的、全党服从中央的、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和领导所组成的队伍。陈独秀在国内、蔡和森在国外不约而同地达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结论。

以后的一切不必再详加叙述。在共产党的党旗下,一大批知识青年领导工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

^①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

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总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当时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在书斋中透彻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学术所得的结果。这是因为建党以后,面临的便是十分紧迫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和革命战争,使人们来不及作任何理论思想上的深入研究,便走上行动舞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更不用说从理论上和实际中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之类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了。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

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因为如前所说,这一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老问题,是曾多次出现过的现象。

有些事例是相当典型而意味深长的。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也劝孙先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①,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康有为是主张兴民权开议院的,但在戊戌变法的当口,却相反地强调要尊君权,要求光绪皇帝独揽大权实行变法。孙中山是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但他晚年却反复强调,“……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②,“如果时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

①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

② 《民权主义》第3讲。

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①。

.....

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侮辱,这个头号主旋律总是那样地刺激人心,萦绕人耳,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这种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有工夫来仔细思考、研究、讨论它们了。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己,并且长期是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

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②,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斯诺曾记

① 瞿秋白《饿乡纪程》,见《瞿秋白选集》第20—21页,人民出版社,1959,北京。

② 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批判,如瞿秋白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商换换口味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了。”(《大众文艺问题》),“智识阶级及学生群众早早脱弃那曾光辉绚烂于一时的‘五四’衣衫!而现在,则是需要——应当——集合在反帝国主义的战旗之下从事于反帝的文化斗争”(文艺新闻社《请脱弃“五四”的衣衫》),均见苏汶编《自由文学论辩集》第333、306页,现代书局,1933,上海。

述说：

事实是因为他们许多人实在都不记得这些私人的细情。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他就把他自己丢开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你不会听见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他们能够无限制地谈论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形，以及几百几千个曾经来往过，而从未听见说过的地方；但这些事情好像只集体地对他们有意义。不是因为当做个人的他们，在那里做成了历史，而只是因为他们的红军到过了那里。在这红军后面，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的有机的力量，而为着这种意识形态，他们是在斗争着。这是一个有兴趣的发现，但因此使我的报告更加困难了。^①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有趣的发现。从进步的青年学生到红军指战员，从北京、上海、长沙等大中城市到井冈山、鄂豫西、延安的穷乡僻壤，从知识者追求真理的个体主义到浴血战斗的工农兵集体主义，并且，长期地紧密地处在农民出身的指战员和农民群众所包围所簇拥所共同战斗的环境中，这一转变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便指出，“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②。毛泽东、斯大林也再三说过，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经过千辛万苦胜利了，而作为这些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们，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

① 斯诺：《西行漫记》。

②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转引自丁守和书，第 484 页。

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特别是现实斗争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在各方面(包括文化和文艺领域)强调民族形式的形势之下。所以,无论是北伐初期或抗战初期的民主启蒙之类的运动,就都未能持久,而很快被以农民战争为主体的革命要求和现实斗争所掩盖和淹没了。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成功,曾经带来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大震荡,某些沿袭千百年之久的陈规陋习被涤除。例如,男女在经济上政治上观念上的家务劳动上的空前平等,至少在知识界和机关干部中,已相当现实地实现。这当然是对数千年陈旧传统的大突破,同时甚至超过了好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解放”一词在扫荡种种旧社会的和观念上的污泥浊水中,确曾有过丰富的心理含义。但是,就在当时,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和行为规约来取代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在改头换面地悄悄地开始渗入。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尊卑秩序的等级制,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忽视和低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拒,随着这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地整个社会以及知识者中延漫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

和意识^①。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特征之一的整风或思想改造运动,在革命战争时期曾大收实效;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再进行,就反而阻碍或放松了对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警惕和反对。特别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作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以至“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

这不是悲哀滑稽的历史恶作剧么?绕了一个圈,过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样的课题?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曾说:

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正是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课,又是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篇。然而,由于中国近代始终处在强邻四逼外侮日深的救亡形势下,反帝任务异常突出,由爱国而革命的这条道路又为后来好几代人所反复不断

① 夏衍有一段回忆,具体生动,有典型性: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远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别’。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

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感而‘不惑’了。”(夏衍:《懒寻旧梦录》,第639—640页,三联书店,1985,北京)

地走,又特别是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始终未认真清算,邹容呼唤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也始终居于次要地位。^①

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并未在中国生根,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是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正是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思想障碍。它与近代民主主义格格不入,蒙昧、等级、专制、封闭、因循、世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到帝王权术的‘政治’,倒成为习以为常的思想状态和正统力量。^②

在思想观念上,我们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五四时代还落后,消除农民革命带来的后遗症,的确还需要冲决网罗式的勇敢和自觉。^③

马克思主义本来诞生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吸取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一切优良的传统和思想。它的三个来源便充分表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历史基地上,才产生和发展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革命的主张,成为无产阶级进行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武器。它揭露、批判、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虚伪性质,也仍然是以接受和消化了资本主义带来的整个文明的进步(其中就包括自由、民主等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各方面)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共产党宣言》也才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鲜明而深刻的基本命题。

① 参看拙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北京。

② 同上。

③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2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北京。

但是,中国近代却没有这个资本主义历史前提,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紧接着便是社会主义。无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上,都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也就是说,长久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了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这就不难怪它们可以借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以前,轻车熟路地进行各种复辟了。于是,“文革”之后人们便空前地怀念起五四,纪念起五四来。

在1939年纪念五四20周年时,毛泽东说:

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已经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①。

在同年纪念一二·九运动时,毛又指出: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

^① 《五四运动》,见《毛泽东选集》第545—546页。

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①

显然,这突出的是五四运动的政治救亡方面。当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时,各方面人士突出的却都是它的思想启蒙方面:

伟大的五四运动到今天整整六十年了。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没有民主思想的觉醒,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②

应该承认,在那时,人们提出个人主义,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们把个人主义作为反封建战斗武器。……打破封建的枷锁,争取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自主权利的号召;表达了他们的要求,激起了他们的共鸣,对他们起了巨大鼓舞作用^③。

①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85年12月1日《人民日报》。

②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见《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论文选》第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北京。

③ 胡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同上书,第305页。

.....

这几年来,对胡适以及所谓“胡适派”的论述或评价,对几十年来那些实业家、教育家、文艺家、学者、教授们在传播、教授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他们在培养人才和在各自专业领域内的教学、科学工作包括深受胡适影响的文史领域的“整理国故”、考证、编纂以及安阳挖掘等等,都作了与前颇不相同的高度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样两条道路:或者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或者是在反动政权下从事他们自称是‘工业救国’‘抗日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的一类工作。……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现象。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在当时感受过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影响,抱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①。

这就是说,五四之后,除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救亡——革命这条道路之外,另一条继续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工作的启蒙方面,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②因为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

不过,应该公平地说,这条道路不但也坎坷不平,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的名教授们连衣食都难以维持,而且,它们对整个社会的

① 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同上书,第282页。

② “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五四运动之后,这一群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了。……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见《北大廿五周年纪念刊》1927年12月17日。转引自彭明书第227页)。

经济、政治,也不能起什么重要影响。中国根本没有提供自由主义者以政治活动舞台的机会。胡适等人二十年代盼望的好人政府仍然只能从属和依附于封建军阀,毫无作为。从二十年代起,自由派们的研究、讨论也只能是书斋中不起实际作用的空议论。

……由一些曾留学英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的《太平洋》杂志,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在研究一些诸如“大总统的权限”“地方自治制度”之类的问题。……1920年在上海出版的《新人》杂志曾专门出版了研究卖淫问题的《淫业问题专号》,并且发起废娼大同盟;北京出版的《新中国》也发表了人力车夫生活状况的调查和关于如何解决人力车夫问题的讨论。这一些可以说是胡适提倡的所谓“多研究些问题”的实践。……都根本不能解决问题。^①

人力车夫如故,卖淫如故,“大总统的权限”无限如故。“多研究些问题”所取得的成就,最多只能限于学术、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中的非常有限的课题了。

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讽刺剧。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却笼盖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该有的忽

①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296页,三联书店,1979,北京。

略,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

三 转换性的创造

那么,今天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是历史的再一次重复吗?使人惊异的是,包括本文一开头引述的陈独秀七十年前《新青年》中的那些主张,如提倡人的自主、勇敢进取、反对锁国、主张功利主义、要真正民主、不要为民作主的清官,等等,却可以在今天好些政治、学术论著和好些青年的思想、主张中看到。五四时期鲁迅的“不读中国书”,钱玄同的“废除汉字”等等激烈的彻底的反传统、批儒家的要求,在今天许多青年的思想和论著中,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这确乎令人惊叹,但又完全可以理解。

不过,重复五四那种激烈的批判和全盘西化就能解决问题吗?我们今天的确要继承五四,但不能重复五四或停留在五四的水平上。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如此^①。不是像五四那样,扔弃传统,而是要使传统作某种转换性的创造。

这是因为,如前指出,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家孔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溶化浸透在人们生

① 当年否定传统主张西化的主张之激烈彻底,恐怕今天的激进者也不及。如:“欲废孔子,不可不先废汉字”。“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钱玄同),“只有一条出路,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理论深度上,今天的彻底否定传统论者似也未能在实质上超过陈独秀、李大钊当年的水平,如李、陈曾指出“宗法家庭本位”、农业小生产经济基础和为专制政治服务等等。

活和心理之中了,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广大农民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孔子,但孔子开创的那一套通由长期的宗法制度,从长幼尊卑的秩序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早已浸透在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之中。其他理论、学派、思想如老子、庄子、道家、佛教,都未能有这种作用和这种影响。

传统既然是活的现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表层的思想衣装,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只有从传统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改换自己。如拙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所强调,传统常常是集好坏于一身,优缺点很难截然分割。这就不是片面的批判和笼统的反对所能解决,而首先是要有具体历史的分析。只有将集优劣一身,合强弱为一体的传统本身加以多方面的解剖和了解,取得一种“清醒的自我觉识”,以图进行某种转移性的创造,才真正是当务之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孔学、墨家的长处与弱点、对早熟型系统论世界观的优劣两面、对宋明理学的理论成就和历史祸害等等的分析,便是企图避免脱离总体来作片面肯定或否定。无论是肯定或否定,脱离总体历史即成为片面的抽象的论证。任何理解都有理解者本身的历史性因素在内。历史离不开历史解释者本身的历史性。也正因为如此,理解传统亦即是理解自身,理解自己也只有通过理解传统而具体实现。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传统既是扔不掉守不住的,按照唯物史观,它有其产生发展和改革变化的经济根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强调指出了农业小生产的家族宗法制度是儒墨两家生存延续的根本基石。正是由于后者没有根本的变动,才使“中国近代这种站在小生产立场上反对现代文明的思想或思潮,经常以不同方式表现或爆发出来,具有强烈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好些人头脑中引

起共鸣”^①。所以文化大革命尽管批孔，却仍然使封建主义大泛滥。前几年小有风吹草动，便一窝蜂自上至下地反长发、剪裤腿、禁迪斯科……，使人很容易想起前面引述过的五四时期反剪头反男女同校的故事。相距已经六七十年，仍如此相似，关键正在这里。只有社会存在这个本体随着科技引入和大工业生产的发达而造成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巨大改变，才能真正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意识、思想情感、人生观和宇宙观。

不过如果以为仅凭经济的发展就会自动地更新一切，那是懒汉的幻想。苏联、日本、港台、中东都可以有较先进的经济水平，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却可以具有保守、封闭、维护陈旧秩序的一面。特别如前所说，中国以至东方缺少西方资本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体制结构上，在文化心理结构上，都有着中世纪传统的巨大阴影。

可见，意识形态的批判的武器并不能坐等基础的改变，而仍然需要自我革新。当前主要反对的还应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往往披着反资本主义的外衣出现，譬如，迄至今日，在理解两性关系上，封建意识就非常严重。重要的是，这种反对和批判应该远比五四时代深刻、具体、细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学性。它们的目的在于有意识的自觉地进行转换性的创造。

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转换的创造，一个层面是社会体制结构方面的。如前所一再指出，与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时代相适应的近代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等，在五四及以后并没能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并没有对它们作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的分析探讨，而是在救亡——革命的浪潮下，一古脑作为资产阶级的破烂

^① 参看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二章《墨家初探本》。

被简单地否定了。今天便应该继承和发展五四的传统，除了重新提出它们之外，更应该对它们作进一步具体的分析、细致的研究和理论的建设。对待中国传统中的一切，也应如此。而不能只是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激情的呐喊或五四以后革命时期的抽象的否定上。目前已经基本赢得较长期的和平环境，国家的富强（现代化）虽然仍是中国人的首要课题，但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毕竟可以不同于军事形势下和革命时期中，今天已不应再是强调统帅意志和绝对服从的战争年月，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提上迫切日程的建设时代。重视个体的权益和要求，重视个性的自由、独立、平等，发挥个体的自动性、创造性，使之不再只是某种驯服的工具和被动的螺钉，并进而彻底消解传统在这方面的强大惰性；在今天比在近代任何时期，便更加紧要。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其实这种个人主义特征是消极的，最多是不合作的批判现实态度，它以庄禅为代表。中国传统中缺少那种积极进取的个体主义，如一切依靠个体自己的独立奋斗、冒险精神，等等。民主问题也如此。中国的传统民主，是“为民作主”，而不是人民作主；是清官、好皇帝去“贵民”，而不是民本身自贵。直到今天，也仍然经常看到这种不应有的思想混淆。把人民作主当成为民作主，这就混淆了古代和近代。近代的自由民主，正如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在大工业生产基地上逐渐成熟的成果，它与中国传统并不相侔，而是自西方输入的。但输入之后如何结合中国固有的重民的集体观念加以发展，是值得从理论和实践上重视的，但首先不能把二者混淆起来，要看到它们在根本性质并不相同。

西方自由主义的大量文献^①表明，自由、民主都不是无限制的随心所欲，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好的理想事物。它们本质上是

① 现代可参考 K·Popper、F·A·Hayak 等人论著。

对人、己权限的一种明确限定和法律规范。严复当年译约翰穆勒的《自由论》为《群己权界论》，是颇有道理的。民主、自由的特点正在于防止最坏的情境发生，如军事独裁、法西斯主义、无政府状况、“肃反扩大化”等等。因之，其中关键一环便是众多法律、规约、条例的严密制定和严格执行。就民主说，几十年中国革命的政治甚至军事生活中，也并非没有民主协商、集体讨论以及群众路线等优良办法和传统；但它们并没能以规范化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推及社会和全国，长期稳定不变。相反，在战争环境革命情势下所形成，由个别或少数人制定、掌握、施行的灵活性很大、变异度甚高的所谓“方针政策”，带来了许多对人民民主的曲解和损失。就自由说，中国传统中有无严格规定的、宽泛的无限制的自由，缺乏有法律有限制的自由，所以常常是强凌弱、众欺寡、上压下，同时又是“一盘散沙”或“一袋马铃薯”式的互不相干的“自由”。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它只能导致少数人的专制和无政府状态。只有建立严格的法制，明确分散各种权力，使之相互牵制，彼此监督，以彻底结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或党委高于宪法、党纪代替国法之类，才能实现近代的具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这不是靠思想教育，不是靠什么正心修身，而是靠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才能达到的。这方面，西方资本社会积累了数百年经验的一些政法理论及实践，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议会制度等等，应该视作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值得借鉴的。想以道德说教解决思想问题来替代政法体制上的进步和改革，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功绩正在于它从深处震撼了、影响了中国人的这个层面。今天还应该继承这个震撼。还有许多事情要作，任务还很艰巨。例如，中国人似乎很重团体，国家、民族常常被置诸首位，但传统道德

要求却是“内圣”之学，即强调个体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西方似乎把个体的权利、尊严作为基础，但它的道德要求倒恰恰着重于社会利益和公共法规。中国的这种“内圣”之学对个人提出的标准是作圣贤的道德最高要求，其普遍可行性甚少。西方对个体提出的则是作一个遵循法律的合格公民的社会最低要求，其普遍可行性却大得多。从中西文化形态的这些比较中，便可看出，以人性本善的理论为基础的儒家孔孟的伦理主义，已完全不能适应以契约为特征的近代社会的政法体制。它曲高和寡造成的虚伪，变成了历史前进的阻力。现代社会不能靠道德而只有靠法律来要求和规范个体的行为。因此真正吸收和消化西方现代某些东西，来进一步改造学校教育、社会观念和民俗风尚，以使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也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便是一个巨大课题。之所以巨大，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既必须与传统相冲突（如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矛盾），又必须与传统相接承（吸收伦理主义中的优良东西）。五四以来到今天，以文学在这方面作得最好，从五四到今天，人们通过以白话文为形式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也包括电影、歌曲和某些美术作品），在扫除封建陈垢刷新民族心灵上，起了重要作用。而这种扫除和刷新又自然承续了中国传统中的积极成份。例如新文学中爱国主义感情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与关心国事民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历史传统便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它又确乎是在对传统中封建主义内容的否定和批判中，来承接这传统心理，这就正是对传统进行转换的创造。

总起来看，历史的解释者自身应站在现时代的基地上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突破陈旧传统的束缚，搬进来或创造出新的语言、词汇、概念、思维模式、表达方法、怀疑精神、批判态度，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去继承、解释、批判和发展传统。

可以举一些例子。例如，对待传统中占有突出位置的所谓“孝”道，便不能再是如五四时期那样简单地骂倒，更不能是盲目地提倡，而是应分析传统孝道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农业小生产、家长制下人格的产生依附性）。今天的亲子关系当然不同，这是在经济、政治完全独立、彼此平等的基础上的稠密人际的情感态度。从而它不能再是传统的“父父子子”，也不是重复五四时期的“我不再认你作父亲，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平等”，而是既在朋友平等基础上，又仍然认作父亲，即有不完全等同于朋友的情感态度和相互关系。敬老亦然。它不应再是天经地义式的“论资排辈”的规范、秩序、制度或习惯，而只能是一种纯感情上的自愿尊敬和亲密。思维方式也如此，简单地斥责中国传统思维的模糊笼统、一切以“差不多”为满足，固然不能有真正的转换性创造，盲目地推崇所谓“东方神秘主义”，更休想转换传统。只有在学习、吸收、输入西方严格的逻辑分析和严密推理的思维方式（这并不难做到，中国人能极有成效地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不但与它不矛盾，而且可以极大地助成它）基础上，来重视中国传统中的创造直观的思维特点，这才可能有助于科学和人文，才可能有助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转换性的创造，而不失去其原有的优点。就情感态度说，酗酒发疯，大搞同性恋，大概并无足取；而传统那种种拘守礼法，行不由径，恐怕也不行。重要的是在树立现代个体人格的前提下，不是以理（社会）压情，也不是一味纵情破理，而是使理融化在情感中。只有这样，传统才能有转换的创造，并在这过程中得到承继和发扬。这也就是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所解释的“西体中用”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 * *

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创刊发行《新青年》，吹响

了五四运动的启蒙号角，毛泽东曾高声赞誉过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①直到晚年，陈独秀从国民党监狱内出来独居四川江津时，也仍在集中思索民主问题。今年是1986年，离1916整70年，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0年，离“四人帮”垮台也已10年，愿以此文来纪念这些重要的年头和这位了不起的“总司令”。

（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① 转引自彭明书第526页。